

# 蔡锷治滇“开源节流”收奇效

面对内忧外患、财政几近崩溃的绝境，制定实施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

曾黎梅

云南僻处西南主高原山区，生产比较落后。清代，云南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00万两，而支出高达近600万两。因此，云南每年的财政支出都要依靠朝廷拨款和邻省协饷。1911年10月30日云南“重九光复起义”胜利后，11月3日，昆明起义军民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军都督，从内政、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等方面采取系列改革行动。但是，此时政府库存银仅剩40余万两，各省协饷也因爆发起义而骤停，中央又无财政支持，而维持各地社会稳定，推行各项改革措施，都需要大量资金，还要支付援川、援黔、援藏军事行动的大批军饷物资。面对内忧外患、财政几近崩溃的绝境，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立即着手整理财政，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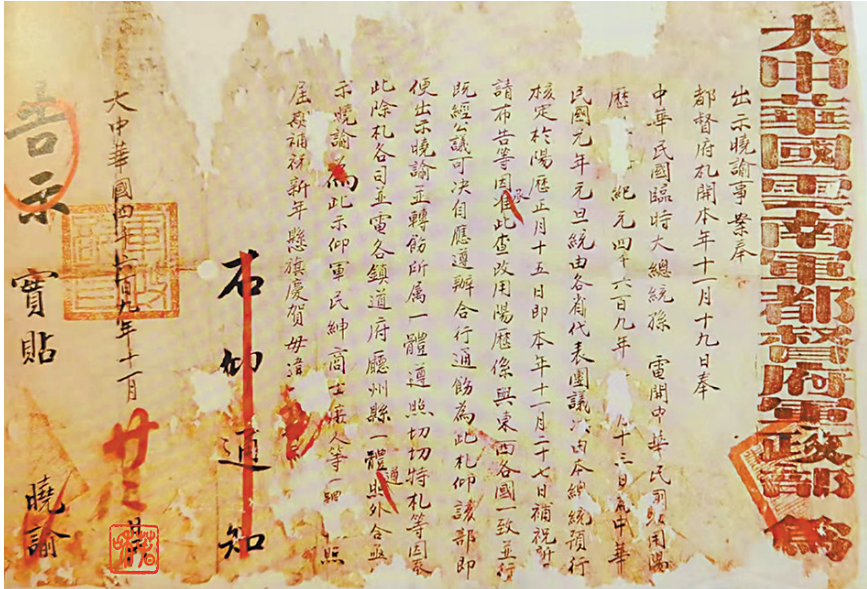
## 多措并举广开资金来源

整顿税收。清末的厘税收入，绝大部分被各级官员和征收官吏扣留。对此，云南军都督府制定措施，对厘税征收实行绅商包办制度，由地方绅商将所能征收到的厘税数目，先交纳一半作为保证金，到年终厘金交清时，再将保证金退还。为加强管理，云南军都督府还实行监征制度，派遣监征员，对厘税征收进行监督，确保征收到位。经过整顿，云南的税收收入较往年大量增加。

筹办公债。为摆脱财政困境，蔡锷原本寄希望于对外筹措，但外国银行集团企图利用对华借款，借机控制我国各种利权，蔡锷只好打消这个念头，改为发行公债来克服财政危机。1912年起，军都督府正式出台《爱国公债章程》，发行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爱国公债，总额为500万两，以本省钱粮地丁银作为担保，5年内分年偿还。公债由富滇银行经营管理，用途由省议会监督、稽查。为推广公债，蔡锷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各界人士购买爱国公债。由于发行的公债并不支付利息，前后收入才十余万元，尽管数量不多，也能暂缓当时的财政困难。

开办银行。云南曾设有大清银行，营业网点仅设于省城昆明。民国建立后，云南军都督府筹设富滇银行，分别在下关、昭通、个旧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和银元，开办存放、抵押、汇兑等业务。据当时的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调查，该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各商号，自1913年就放贷302万元。富滇银行的开办，对促进云南商业的发展、稳定市场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革新盐务。盐课和附捐是云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政府为加强对盐税的征收管理，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一是撤销盐道，将盐务改归实业司管理；并将原有的课税以及附加的各种税收合并计算，更名为“盐款”；二是新设督煎、督销总办等机构，加强对盐务的监督；三是实行就各盐井征收“盐款”，杜绝侵挪亏欠，款目繁杂等弊端；四是新开盐井，严禁进



1911年11月23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发布的改用公元纪年布告。



云南“重九光复起义”后被推举为军都督的蔡锷将军

口緡越私盐，省内人民可以自由购买食盐。改革措施施行后，各地盐井逐渐发展起来，在1913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占云南财政总收入的23.2%。

振兴矿业。蔡锷力主把发展矿业作为云南经济开发的重点，认为要发展云南经济，“非开矿无以辟利源”。军都督府以开放、保护为宗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一是调查省内资源分布情况，发展重点企业。通令各地方官员仔细调查当地矿产情况，将调查结果分为“已开矿山”“未开矿山”和“已开荒废矿山”三种类别，以便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开采。军都督府还在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所，勘察省内的矿产情况，为冶矿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对于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两种知名矿产，军都督府重点维护，加大宣传，促进两大产业的发展。二是积极引导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向中央申请资金援助失败后，蔡锷只好努力引进外资。为了吸引华侨组织公司来云南开采矿产，军都督府制定《云南矿务暂行章程》，对华侨公司给予特别保护。蔡锷向袁世凯及国务院请求，派遣久居南洋、在华侨中颇有信用的前南京临时政

府司法部部长吕志伊前往南洋和美、澳等国，招募华侨到云南投资办厂，同时致电上海华侨联合会，欢迎华侨到滇投资。云南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由于交通不便，开采技术落后，内地各省都选择进口国外矿产。为解决这一问题，蔡锷派遣实业司副司长前往日本调查实业，购置机器，提升采矿机械化程度，逐步推进云南冶矿业的发展。

发展农林工商业。在农业、林业方面，军都督府实业司成立云南农务总会，以归化寺、华亭寺的年租作为农务总会一年的运作经费，推广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协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在昆明设立农林局，地方设立农林实业团，订立垦荒、畜牧、森林等相关章程，积极推广改良后的种棉、制茶法，收到较大成效。在工商业方面，调查全省工艺出品和商业状况，设立模范工厂，分为金工、化工、染织、缝纫、陶瓷、印刷几大类，利用云南本地的原材料和固有工艺加以制造推广，整顿商品陈列所，供商家观摩。通过整顿，云南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工商业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兴旺，市场繁荣。在军都督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民国初年的云南出现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

## 严格制定办法节省开支

蔡锷认识到，只求收入之方而不谋节流之法，只会增加国民负担，而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困境。因此，在努力“开源”的同时，也严格制定各项“节流”措施。削减薪俸，裁汰冗员。为节省开支，蔡锷致电省内各军政长官，要求减少官员薪水。1912年1月，蔡锷下令裁减薪金，并制定裁薪办法：上等一级官员120两，二级120两，三级100两；中等一级官员80两，二级60两，三级50两；三等一级35两，二级20两，三级16两。半年后，

蔡锷又提倡并带头进行第二次减薪。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原薪60两以上的一律减少为60两，以下递减，目月薪金暂时不变。据统计，两次减薪共节省开支32.8万元和50万元。同时，军都督府下令裁撤政府内部的重叠机构及闲散人员。新政策施行后，云南军都督府收入支出多有盈余，府库充裕，甚至援川、援黔、援藏的军费也能够自给。

剔除陋规，提倡节俭。陋规是清代地方政府不能公开的“灰色”收入，几乎一切办公费用都在陋规金上开支，给人增加了巨大的负担。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一等府厅每月的公、杂费为450元，二等府厅县为350元，三等州县为250元，地方收入全数上缴省垣，革命前所得的陋规必须归公。地方收取钱粮杂税，须由地方团体、绅士监收。公务人员不得侵吞缺额薪饷，不得请客送礼，不得受贿和侵占公款，兼差人员不得兼薪，不得挪用公款，不准滥行宴会。曾任云南军都督府秘书官的陈度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一书回忆，蔡锷规定非星期日不可宴客，一席之费也不可超过五元。当时的警察厅长在非星期日宴客，邀请蔡锷参加。请帖刚送到蔡锷手中，他就上面批下“违背命令，罚薪半月”，闻者莫不诧异发噱，而奉令惟谨。“这件事发生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在非星期日宴客。书中还对蔡锷有这样一段描述：蔡都督崇尚节俭，穿着极其简朴，盛夏惟白衫衫一袭，袖染墨痕，襟有穿孔，无更易者，军服亦不华丽。求之近世伟人，不可多得。在蔡锷的影响下，民国初期的云南政界一时以廉洁为风尚，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竟可以节省50多万元。

裁撤军队。清政府统治时期，云南不仅有新军，还有巡防队，每年的军费开支需300多万两，占云南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云南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迤西、迤南地区不断招募新兵，援蜀、援黔又添置了大量军队，军饷耗费数额庞大。省内安定后，蔡锷下令裁撤军队数十营，迤西军队裁撤后仅剩7营，每营300人的编制。援蜀、援黔结束后，又裁撤了30多营。大规模裁兵后，云南在民国元年、二年分别节省了104.65万元和178.2万元的军费开支。

蔡锷“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措施，在短短两年之内制定并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12年，云南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结余近20万元。在全国动荡、外患未靖的情况下，云南“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记载，辛亥革命初期的昆明，时和年丰，百姓安居乐业，鼓腹含哺，大有开国盛时气象。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也评价辛亥革命初期的云南：“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 诗文云南

# “云南在天上”

本报记者 耿嘉 文/图

云南著名学者、清末经济特元袁嘉谷所撰，考证云南历史文化史的笔记著作《滇绎》，开卷就对云南的简称“滇”字，作出精要考证：

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庄跻由楚沅水潮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国王、滇王，皆含自大之意。《史记》：汉使者至滇。滇王问：“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盖自战国迄西汉又数百年，而滇王自大之意且露于言辞间矣。然今人之讥自大者，辄言夜郎而不言滇，可知滇有自大之资格。故《史记》云：“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山川疆土，西南一奥区也。《文选·上林赋》“文成颠歌”注引文颖曰：《史记》：迤西县名。颠，盖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与“滇”同也。《汉书·相如传》注作：“颠，即滇也。”

袁嘉谷对“滇”字的考证，有很多有趣之处。比如，提出以“滇”为地名，是出自最早由楚率兵而来的庄跻。比如，认为滇王有自大的资格。又如以《说文解字》《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文献，论证“滇”“颠”相同，都是极言其高之字。而“颠”又与“天”同义，古人以“滇”命名这片地域，就是认为这一地域像天一样高。在另一则笔记《“滇”字之异解》中，袁嘉谷还指出：“滇字惟滇池用之，他处罕见。”所以，后来才产生那句大约由平原地带一路攀高西进，到达云南之人说出的感叹性谚语：“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对于为什么这样说，清代第五十二任云贵总督阮元，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之说。

清道光八年(1828年)春，就任云贵总督已经两年的阮元，邀约云南学政李棠阶(号文园)同游昆明城西太华山，并在山上的太华寺休憩。阮元为此写下了一首二十韵的五言古诗《同李文园学使(棠阶)游太华山，憩太华寺》：

华岳五千仞，峻增上金天。

若与滇池较，池在华岳巔。

池上有高山，名借太华传。

华阳勒国志，地括南中滇。

梁州与黑水，自古西南连。

颠县昔汉郡，太华居西偏。

城中看西山，苍翠隔野烟。

春风得闲暇，胜侣邀一贤。

出城载茶棹，适野敲吟鞭。

拾级入古寺，楼殿逾百年。

寺南启虚堂，万顷何茫然。

浩浩天外浪，棱棱草际田。

双塔辨迤邎，片帆识渔船。

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圆。

搔首或落雁，登顶难采莲。

石室虽可攀，未许希夷眠。

我无摄生术，神昏力衰孱。

为语滇池侣，安能从羽仙。

惟当随滇流，乘槎归日边。

这既是一首乘闲踏春的记游诗，也是考据气味浓厚的学问诗。前六联，就先考究“太华”山名及其历史地理，极言滇池之高。第七至十七联，才记述从出城、上山、入



清陈重庆题雷鼎庵主阮元画像

寺、登顶的结伴游憩所见所思。最后三联，抒发登高远望，想到由滇水可以一路东下，到达日出之海，而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何时能够回归京城的感慨。长诗后面，阮元又写下一段跋文：

水地大势，陕华州约略与蜀夔州相平，乃重庆叙州江远而高，仰逾千里，金沙江又高流入叙州江，滇池又高流入金沙江，共数千里，是滇池高于华顶明矣。若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江，又入蜀江，入汉江，沂淮渡河，竟可直达天津矣。太华之名，不知起于何代，以《禹贡》“华阳梁州”及常璩《志》推之，此山名为太华极宜。颠县即滇县，见《汉书志》。太华出山半之寺，起于元代，大建于康熙时，其木石皆范总督承勋毁吴逆故宅运去者。范公有《太华纪胜》文，刻大理石，嵌石堂壁上，石巨盈丈，真瑰材也。寺中有明沐藩世代像，亦有范公像。

这段跋文，主要是针对诗的头两联作进一步解说。本来“华岳五千仞，峻增上金天。若与滇池较，池在华岳巔”两联，已经用对比的方法说明，在世人眼中，五千仞的西岳华山，已经是高耸入云天，然而滇池的地势如同在华山顶上，因此滇池就是高居天上的“天池”，更不用提高耸在滇池边上的太华山了。大约是因为受古诗体制的约束，不便将此意说清，阮元只好在诗后，再以这段跋文，说明华山所在地陕西华州，不过与四川夔州地势相同，但是从水流来说，夔州的江水，是由“仰逾千里”的重庆叙州流淌下来；叙州的江水，又是从更高的金沙江奔流而来；金沙江又更为高远的滇池地域钻山越岭而来，所以滇池远远高过华山之顶，是最清楚不过的事实。阮元随后还说，“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江”，顺流东下，越过淮河、黄河，可达京津之地。

阮元这首春游诗及其跋，以华山为参照，从水流地势高低差异对比分析，得出层层攀高与逐级下降的考据表述，不就是“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的具体表达吗？对比诗仙李白《夜宿山寺》绝句所写：“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再来看阮元这篇诗文有理有据的对比分析，那么，古代从中原或江南之地，首次舟车劳顿或者步行、骑行来到云贵高原的人，惊叹“云南在天上”，就不是夸张的说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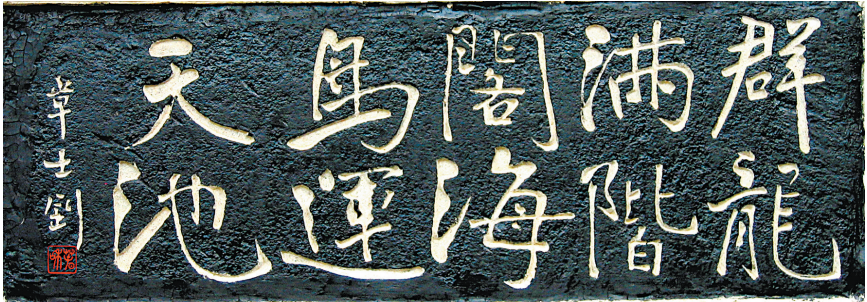


从西山俯瞰滇池

# 腾越来凤书院的文教传播

办一所书院，撒一片种子，育一批人才，代代接续成链，传播中华文化

吴兴平



李根源石刻章士钊书集句联：群龙满阶阁 海鸟运天池

腾冲市的腾越来凤书院，是云南书院史上最早创建的5所书院之一。据《保山地区教育志》记载：来凤书院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由兵备道赵炯倡议创建，初名“秀峰书院”，地址在腾冲城内州学前，成为保山第一所书院。嘉靖年间，秀峰书院改称“春秋书院”，迁址至学宫右侧，以后，又改名为“凤山书院”，至清代，再改名为“来凤书院”。清末，来凤书院改为腾冲县立高等小学堂，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过师范传习所。随后几经演变，成为今腾冲一中办学资源的一部分。

腾越来凤书院历经风雨，至清末呈现出一定规模。肖雄著《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中载：“其建筑规模是：正房书楼三间，两边耳房各两间，左右厢房各三间，讲堂三间，右建客厅三间，看间房三间，八字墙大门三间，照壁一座，左右院门各一道，周围内环以墙两座。就建房子而言，共有36间。”“按当时书院的建制，属于比较大的县、州级书院。”书院定址并成规模为正常办学，培养人才提供保障。

## 藏书授学 刻书服务社会

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腾越来凤书院藏书来源渠道多样，由官府拨款购置、官员购捐、热心人士义捐和书院购买、刻印等。《保山地区教育志》载：“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及历任官员不断筹资购置图书、设备，同知黄炳坤也先后拨款5000两购书，使书院藏书达到3万余卷。”肖雄著《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中载：“同知陈宗海捐廉购置群书，束以夹板，藏之藏书楼榭中。”“陈宗海捐廉购置的书籍，包括《御纂周易折中》《昭明文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在内的图书，共四十部，计一千五百一十一册。”“腾越厅来凤书院，有刊刻书籍存板，其中有《圣谕广训》一部、《腾越厅志》一部、《科场条例》《弟子规》等书籍存板，随时需要可随时刊印，十分方便。”

用木刻板印制成书籍供应社会之需，是腾越来凤书院一个时期的重要活

动，突显了其办学的开放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国书院史研究专家陈谷嘉、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讲道：“云南腾越厅(约当今腾冲、梁河、盈江、陇川、畹町、瑞丽等县市)，与缅甸接壤，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一般的书籍只能靠厅城(今腾冲)来凤书院刊印供应。光绪《腾越厅志稿》卷十载‘新刊书籍存板’目录计有《四时读书乐》(附《九成宫》等字帖)、《弟子规》《童蒙辑要》(附《小儿语》)、《字学举隅》《仕宦金针》(附《三圣劝世文》)、《寻常语》《科场条规》《经验良方》等，而院中藏书目录所载则有四十种一千五百一十一本……非常明显，来凤所刊之书不以书院为主要供应对象，而是向社会提供普遍用书，以满足公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卫生生活需求。故此，来凤书院即可视作腾越全厅的一个出版机构。”以上内容说明，腾越来凤书院不是“闭门”授徒，它还关注社会之需，为社会公众提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文化产品，在传播文化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 教师辛勤耕耘 培养众多人才

腾越来凤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不仅体现在藏书授学、刻书流传等社会服务方面，还体现在历任书院山长、主讲的奋力耕耘及所培养的人才的接续传承方面。这是腾越来凤书院教育教育、文化传播功能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在很长时间内形成一个接续的传播链。

在腾越来凤书院历任山长中，赵端

礼实为鸿儒，任来凤书院山长(校长)15年。赵端礼(1824—1910年)，字用甫，号会楼。清光绪五年(1879年)，赵端礼赴省乡试中举，曾先后授大姚、顺宁等县教谕，均不成，甘愿回乡做一名老师，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腾冲历史上的一代名师。他执教书院时说：“为学当以义礼检束身心，否则考据虽博，终是为人之学也。”“读书人乃生民立命种子，无论穷通显晦，需以正人心，维世教，端风化为己任。”要求学生把“立志、敦品、力行、习苦、尚名节、不欺、博学”这七条当成座右铭，“正人心”“维世教”“端风化”含义深刻，不失为以文教化之要义。据《二赵先生教思碑》所载：“腾冲洞山吴邑赵氏教育世家，有四代人先后掌教腾冲来凤书院，教泽广被，士林承荫，成材不可胜计。”“其师教之文献大有鸿篇，然经兵燹劫乱，所剩无多。幸得赵端礼(会楼)之孙赵敬业先生于劫乱之余搜集诸先辈遗著，将吉光片羽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四川乐山辑纂，用蜡纸钢板手刻油印成《赵氏家集》传之天壤，以示后人。”碑阴刻有二赵先生的前后及门弟子146人的姓名、表字及功名，其中举人6人，贡生35人，生员等105人。其中赵端礼掌教时的李根源、张成源、寸辅清、革孚言、张映璠、吴嘉禄等，是来凤书院门下的代表性人物。

李根源(1879—1965年)，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国务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根源曾两度共8

年时间在来凤书院就读，师承赵端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根源16岁时入腾冲来凤书院读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李根源赴省参加乡试，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停考，又回到来凤书院继续深造。后李根源开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陕西师范学校等，弟子遍布南北。李根源在文献典籍的编纂、金石考古、游历著文等方面卓有建树，既是知名学者，也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私家藏书丰富，著作等身。李根源寓居苏州期间，在苏州小玉山打造了“露天书法博物馆”。据沈红娣著《李根源与小王山》载：“李根源在小王山的十年，成就了一座中国近现代名人书法艺术的露天博物馆，留下了章太炎、于右任、黎元洪、郑孝胥、章士钊、沈钧儒、张继、蔡锷、李烈钧、吴昌硕、张大千等叹为观止的杰作。”

寸辅清(1867—1915年)，又名程清，字佐廷，号芝坡，24岁考中辛卯科举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李根源同期，寸辅清得官费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回国，创设永昌师范学堂，接办腾越高等小学堂，为滇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寸辅清在任镇南(今南华县)知县时，因力保一方平安，成绩卓著，得到嘉奖，被授予“六等嘉禾勋章”一枚。1915年，腾冲中学创办，寸辅清调回腾冲，任腾冲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寸辅清去世后，李根源先生撰文赞曰：“润富存乡献(注：杨润富，腾冲古永人，精于史学)，成谦争边士(注：张成谦，和顺乡人，曾为清朝廷勘察滇缅边界)，辅清创学校(注：辅清即寸辅清)，皆有功于梓桑，可以为腾之士矣。”

办一所书院，撒一片种子，育一批人才，代代接续成链，传播中华文化。腾越来凤书院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代代名师诲人不倦，大批学子接续传承师授之学和训导，腾越来凤书院文化教育、传播文化的种子播散在云岭大地上，萌发生长，枝繁叶茂，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